

13.09

31



上杭文史資料

3

1983

上杭文史資料

第三期

· 内部资料 ·

1983.7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上杭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组

一九八三年七月

上杭文史资料

第三期

目

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上杭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组编

- 福员山与宜春王 马文洪 (1)
清代水师提督钟宝三 丘松林 (3)
《爱国志士丘逢甲》补遗 张启芳 (7)
- 背水一战 蓝汉华 (9)
郭义为烈士传略 刘宝联 (13)
我所知道的丘织云同志 刘鹏飞 (17)
上杭县店员工人反封锁斗争片断 蓝尧章 (18)
大岭下六次”移民“纪实 范敦宝 (21)
龙田书院和南阳会议 黄 宁 (25)
闽西第一所红军医院 刘宝联 (27)
参加红军长征的上杭二位女同志 华 兰 (29)
才溪乡的共产儿童团 楚 芳、启 芳 (30)
大革命时期上杭青年学生运动 序汉奎、傅如通 (33)
- 上杭国民党及三青团组织的梗概 曾先林 (40)
林志光竞选“国大”代表记 林凤年 (44)
- 漫谈上杭客话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色 赖元冲 (49)
上杭电影事业的创建与发展 鲁海亭 (56)
- 回忆省立杭中 司徒慧 (61)
上杭二中沿革 李炳模 (66)
半生当借卖，一室画诗书
——书画家丘 汶先生简介 嵩 龄 (69)

目

- 先君省予先生事略 宋展生 (72)
新加坡南洋上杭同乡会 庾锦昌 (77)
庄背庙史话 王新 (80)
丘宏《杭川十景》札记 蟻叟 (81)
双康访古 陈复才 (90)
杭川岁时记 吴梅林 (92)
上杭民间娱乐 蓝汉民 (105)
九洲地名由来 钟文选 (108)
杭梅点滴 李伟民 (109)
园山第一区 马超成 (111)
石山名茶 郭銮兴 (112)

录

上杭县印刷厂印刷

一九八三年七月

- 封面题字 伍洪祥
封面设计 庾伟民
照片：
山水、翠鸟 丘 油遗作
丘能鲁供稿
水仙、雄鹰 宋省予遗作
宋展生供稿
南泉古刹 罗晓帆供稿

福员山与宜春王

马文洪

上杭县东，距城约七十里许，接近杭永交界的地区，由天龙山过凹起顶的高峰，名福员山。层峦叠嶂，耸入重霄，壁立千仞，其顶平敞。在云蒸霞蔚的景色中，远望之如盖如仓库。其西出一支为石门山，有石灵宫，石门景最幽奇，两边石壁巉岩，一涧中流，如天然图画，为上杭邑中名胜，有联云：“胜运无双地，圆山第一区”。

当南明半壁河山即将沦亡之际，上杭李鲁曾在此山隐耕、筑寨，创立忠义社，四周人民的生产生活，得以保障。一六四五年七月，明裔朱聿键在福州勉维残局，而其势已成弩末，次年即一六四六年八月，奔汀州失败。当时李鲁在上杭屯兵训练，听到消息，即以身殉难。一六四七年江苏人何应佑，时为中书令，推戴明裔宜春王，到福员山，投李鲁，到达目的地时，始知鲁已殉难，应佑痛哭，有：“丙戌九月汀州破，丁亥会宜藩从公，公复死难，而明竟亡”之语。宜春驻此，号召遗民图恢复，利用福员山顶的平坦，有可容千军的广场，从事屯练，复联络李鲁生前组成的忠义社社员多人，揭旗举义，一时遗民毕集，气势甚威。其中湖梓里的社员丘淑教膂力超群，所用铁钯六十斤，挥舞自如，大有一往无敌之概。宜春在此屯军三载，又察知这地方的土壤肥沃，从事耕种，大有可为。于是决定边生产、边练兵。又凭着山势，筑起土城，城外多栽名茶，山南派将扼守要隘，下有潭涧，将军常于此处抗御清兵，故有将坑将军潭之称。湖梓里丘姓族人，大都为忠义社员，迭被中伤，受祸非浅，宜春驻地，也时受威胁。其间健勇如丘淑教等，都相继殉难。宜春驻此三年毫无进展，

势穷力蹙，惟有一走了事。福员山遗迹有王殿，原系垒石而成，宜春携来物品尚多，内有明太祖像，花瓶龙碗，当时贮于大士宫内，宜春走后，藏于湖梓里丘姓家。明祖像高四尺二寸，面右侧坐，手着膝；大龙碗阔径一尺，高五寸，画有五爪龙及飞凤形，明嘉靖年间窑造；小龙碗有二，画松竹梅，径七寸，高四寸，为明成化间窑制。其他物品，如头盔等，因光绪十六年即一八九零年遭火遗失。像和碗保存到今，已三百三十年左右。

福员山巅，除李鲁的“采薇深处”外，还有福员山馆，原系湖梓里丘氏祠堂，士人爱其高敞，多肄业其中，观小河如襟带，石门汶水夹其左右，万家灯火，近在眼前，人们故多登山览胜；曾记前人有福员山吊古诗，首云：“吾乡南耸福员山，高入云际雄天关，左睥石马右双髻，天星尖峰东西环”。又“剩水零山付渺茫，神龙见首尾潜藏”。末咏“摩挲古物发遐思，瞻拜人来座常满。”云云，或系指宜春来去之飘忽与遗留古物，供人凭吊。

注：本文参考《上杭县志》大事志、山川志、古迹志、列传、流寓传、杂录及《杭川新风雅集》，辑录而成。

清代水师提督钟宝三

丘松林

清代闽浙水师提督钟宝三，字泮宗，号鑑堂。道光十四年生，咸丰二年十八岁袭父职。二十岁任副将，二十三岁任参将，二十八岁任太守，三十三岁任总兵，三十六岁晋升提督。光绪三十年卒于上杭官庄圆通山佛祖庵，享年七十有二。祖籍上杭城郊石砌下村，距县城十五公里。同治末年在村东建提督府。府第为砖木结构，三栋二摆一庭院，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富丽堂皇，蔚为壮观。中堂屏风上方高悬“世笃堂”金字牌匾，后堂置有“御前侍卫”金底黑字匾额，前堂（中门）挂有“提督军门”牌匾。院坪立有一对大型石狮子，大门置有石象、石马和石鼓，门外竖有两根石桅杆，上刻对联为

“雄风倚画栋，壮志扭乾坤”。解放前，在此设立“三益乡中心国民小学”；解放后，曾是梅溪人民公社所在地。1973年被“六一”洪水所毁。

钟宝三生于武将门第，祖父虎翀曾任御前侍卫，享有袭职特权。父亲炳斋曾任总兵。①宝三秉性好动，幼年爱练武，成年身材魁梧，力拔千斤，斗酒秤肉。乡亲称赞他为将门虎子。十二岁，宝三就读于三十里外的福仙庵私塾（旧县河西）。咸丰二年，当其父边关殉难噩耗传来，时宝三年仅十八岁，即起程赴边关袭荫职。到了边关，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屡建奇功。在英吉沙士长期鏖战中，边关总兵伍魁指挥过于谨慎，师久无功，宝三大胆献计，伍总兵采纳了宝三计谋。

宝三又自告奋勇，独自深入敌巢，杀敌主将，里应外合，歼灭敌寇，取得了边关决定性胜利。宝三从副将升为参将。伍总兵在奏本上，称宝三是一位大智大勇的将才。不久边关告捷，宝三回到福建，出任漳州太守。

在任太守时，忠于职守，为官公正，爱民如子，不畏豪强。他上任的头三个月，一气审理了十多起成年人命官司，均系豪门欺压良民者。杀了一批作恶多端的豪绅恶棍，其中还有一个贪赃枉法的知县。事后，受益百姓大办厚礼，酬谢太守。有送莲藕土产者，有送金银绸缎者。钟太守对送藕人说：“下官永铭你的心意，做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清白人”。对送金银绸缎者说：“黎民百姓向官府衙门奉送金银财物，是犯法之举。请马上收回，否则当即升堂审理”。几年间，辖地出现了农桑发达的升平景象。由于钟太守政绩显赫，为入闽的钦差大臣所赏识，回京后为他请功封爵，嗣后复奉职总兵，在三年之内，连升二级，由总兵晋升提督。所谓“武官武到督”了。

在提督任上，钟宝三恪遵祖父遗下的“精忠报国”家风，忠君爱国，治军有方，军纪严明，军威大振，屡平倭乱，安定海疆，每年均获兵部嘉奖。

闽浙总督王懿德、福建巡抚吕铨星狼狈为奸，涂炭黎民，怨声载道。闽地政治腐败，民间流传着这么两句歌谣：“总督王懿德，名存二心，一心祸国，一心殃民；巡抚吕铨星，姓有两口，小口抽烟（鸦片），大口食人。”^② 钟提督出于忠君报国爱民本意，分别拜访王总督和吕巡抚，交谈中流露出“食君禄报皇恩振兴社稷爱万民为本份”言词，并将民间流传的那两句歌谣直言转达。但忠言逆耳，王、吕二人嫉贤妒能，早已心怀叵测，借机联名修本上京，参了钟提督一本。诬陷钟“煽动刁民，滋生事端，陷害朝廷命官，颠覆大清江山”。适逢咸丰驾崩，西宫那拉氏—慈禧宫廷政变得逞，朝廷多事，官场多变，社稷多灾，黎民多难。王、吕诬陷钟提督的奏折进了朝廷，淫威

发作的慈禧太后传旨兵部，加予钟提督“邪恶异端”罪，革职还乡，解甲归田。时年四十八岁。

为民蒙冤还乡的钟提督躬耕度日。一年后，总督王懿德、巡抚吕铨星相继下台，钟提督横遭诬陷一事朝野广传。当年提携钟提督的钦差大臣出任兵部尚书。新任福建巡抚郑某巡视汀漳道，路经上杭，顺道看望钟宝三。郑巡抚刚到村口，见钟宝三偕同第三夫人邱氏在田头浇施人肥，无视袭人臭气。郑巡抚深为感动。是日，郑巡抚即投宿提督府，与宝三促膝谈心。嗣后郑对钟案修本启奏朝廷，昭雪冤情，请官复原职。

是年，兵部行文福建，昭雪钟提督冤情，并委任钟宝三为汀(州)漳(州)道总兵。宝三熟思之后，以体弱力衰无能胜任为由，辞去了总兵职务。是年才五十岁，正是年富力强，而断然辞职。究其隐情，实为俗谚所谓“一代做官三代绝”所警惕。回顾后嗣，又极不肖。缘钟宝三的元配夫人李氏未生男孩，收一义子。第二、第三夫人张、邱氏各生一男孩。^③三兄弟均系不肖之辈。既不习文也不练武，嫖赌逍遥吃鸦片，被人称为“将门鼠子”。钟提督一气之下，将大公子逐回原籍，把二公子三公子赶回家乡滚泥巴，旨在改变生活条件，指望其改邪归正。谁知兄弟俩回到家乡，成了脱缰之马，更是放肆，变本加厉，作威作福。尤其是三公子民愤极大，邻村梅溪寨何屋坊具呈告到了钟提督案头。^④钟提督气愤异常，忍无可忍，大义灭亲，下令处决了三公子(祭祖坟)。二公子目睹三弟下场，吓得外逃，漂泊南洋，定居新加坡。^⑤

第二年，钟提督元配夫人病故任所，丧事好不一般，收到烛礼金银成担。当时，钟提督心事重重，隐痛加剧，提笔疾书一副对联，曰：“夫人死将帅临门，将军亡士卒不至。”将对联交付管家收藏，嘱咐待他归天治丧之日启封挂出。日后之事，完全在他预料之中。

钟宝三不愿出任总兵的当年，毅然上了圆通山，出家修行。^⑥庵

堂方丈念他是提督大员，不忍给他削发，恭迎他在山上安度后半生，并供给他房舍田园。但他执意拂红尘入佛门修善果。从此后，一位叱咤风云的提督大人，成了佛门弟子。

钟宝三在方丈照应下，辟有佛堂。他在晚年，给自己佛堂挂上一副对联轴，亲笔书写了上联：“天地有情容我老”，下联空白着。庵堂方丈和众师兄弟以及朝山弟子，无人知其奥秘所在。人们请教钟提督，他神秘地苦笑着说：“待日后有人给我联下去时，你们就明白了。”钟提督逝世后几年，福州鼓山有一老和尚云游四方来到圆通山。老和尚见此对联，感到奇怪，问明情由，悟其奥秘，提笔书写了下联：“子孙无用惹人嫌”。^⑦老和尚还向庵堂方丈提出建议说：“钟提督非平庸官家辈，该制作塑像供后人瞻仰敬以香火”。之后，方丈派人从山外请来雕刻名师，制作了一尊木质戎装钟提督坐像，供奉佛堂，香火极旺。此塑像一直保留到“文化革命”前夕。^⑧

注：

①钟宝三手抄族谱。（以下简称“族谱”）

②钟琪文口述。

③族谱。

④今石砌、梅溪老一辈皆云实有其事。

⑤钟提督的第四代裔孙景华、景辉曾于1948年从新加坡来函故乡寻根究底。

⑥今圆通山庵堂有史可考。

⑦同上

⑧本文笔者曾在解放前夕见过。

附记：

有关钟宝山的资料，原县志称钟宝山即钟虎翀，字炳斋，嘉庆七年武科进士。现据钟氏族谱和墓碑（现存村小学操场西边圳沿上）记载，十五代钟虎翀为武进士御前侍卫，其子十六代炳斋为睦南关总兵，其孙宝三为闽浙水师提督，袭父职发迹。

爱国志士丘逢甲补遗

张启芳

丘逢甲从小就天资聪颖，刻苦好学。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应福建乡试，成绩优异，第二年春去北京会试，中第八十一名进士，被钦点为工部主事。

丘素怀大志，爱憎分明。鉴于当时清廷政治腐败，对外屈辱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遂无意仕途，告假回乡，致力于教育。他认为要挽救民族危机，首先要开发民智唤起国人之觉醒。于是在台湾“集中精力讲学，除授文艺课外，还兼讲中外历史，注意用新思想启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并劝人阅读报刊文章关心时事”。①

丘逢甲是一位躬身力行的爱国志士。甲午中日战争发爆后，败讯频传，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预感到台湾的危难即将到来，故忧心忡忡地说：“天下从此多事矣，日人野心勃勃久垂涎此地，彼讵能恝然置之乎”。②于是他向台湾同胞大声直呼：“吾台孤悬海外，去朝廷远……惟吾台人自为战，家自为守耳”！③号召台湾同胞“抗倭守土”，保卫家乡。同时他又自己带头捐资组织义军。他与当时抗日英雄徐骧是同乡。当甲午战败，一八九五年四月清政府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恨，纷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斥责清政府卖国罪行，台湾同胞更是义愤填膺发出抗战檄文。一八九五年五月底，日军在台湾基隆附近登陆，丘逢甲积极参加了保卫台湾的斗争，带领义军坚守台中抗击日军登陆。不久台北告急，他又率部北上支援，惜未到达，而台北已沦入敌手。日军侵占基隆、台北后，

沿铁路南下直逼台中的新竹，丘逢甲指挥义军坚决抵抗。血战二十余昼夜，卒因弹尽粮绝，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终于失败。丘逢甲“知事不可为”^④乃含恨内渡，回到大陆仍眷念台湾同胞，为了不忘收复台湾，他特将儿子丘琮的名字改为“念台”。将自己的书室命名为“念台精舍”，并一再写诗勉励叮嘱台湾同胞“为言乡父老，须记汉官仪”。要时刻记住自己是炎黄子孙。^⑤

由于丘逢甲是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故在辛亥革命时期，这位晚清的“进士”已倾向革命。1908年他秘密在广东参加了同盟会。他曾利用自己在广东的声望和社会地位，为掩护革命党人做了不少工作，朱执信、邹鲁、陈炯明等都是他的学生，并都受过他的保护。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后，他感到非常高兴，曾说：“内渡十七年，无若今日快心者”；“革命军从此推翻清室建立共和……洗雪国耻，恢复故土，指日可计”。^⑥

丘一生忧国忧民念念不忘故土台湾，其爱国之精神实使人感佩。由于奔走国事，积劳成疾，1912年2月5日在广东蕉岭去世。在弥留之际他犹眷念台湾，嘱咐家属“葬时须东向，吾不亡台湾也”。^⑦

注：①《历史教学》1982年10期

②江山渊：《丘逢甲传》

③江山渊：《丘逢甲传》

④丘辑辅：《仓海家兄行状》

⑤、⑥《历史教学》1982年10期

⑦江山渊：《丘逢甲传》

背水一战

——记豪坑战斗 兰汉华

豪坑战斗，拉开了我七支队入闽作战的序幕。这一仗，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树立了七支队的军威。

抗战期间，党领导的闽西游击战争迅速发展和壮大。为此，蒋介石惶恐不安，如坐针毡。抗战结束，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没有改变它的反动政策，反而变本加厉，发动了祸国殃民的三年内战，对我游击地区进行更加疯狂的“围剿”，对红色地区人民群众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他们在上杭县新成立了“福建省保安第四团”，到处抓丁拉夫，纠集了数以千计的反动武装，由上杭县伪参议长李玉出任团长。同时，各县自卫中队、乡保武装也加以充实、扩大；国民党龙岩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也成立了自卫总队部，统由福建省第三清剿指挥部率领，妄图作垂死挣扎。在此情况下，我支队奉命进军上杭、长汀等县。当时，我任支队长（化名唐棠），政治委员是范元辉，副政治委员是丘锦才，政治部主任是胡伟。

入闽前夕，我们认真分析了敌情，并对干部、战士进行了动员。我们认为有利条件很多：上杭是老苏区，有地下党组织，群众基础很好，党在群众中威望很高。地下党的同志和革命群众热切盼望我游击队进军上杭。但我们也看到了困难的一面：敌人的装备和战斗力胜过广东地区的敌人，伪福建省保安第三团朱家齐部一直纠缠着我们，同时上杭新成立了保安第四团。所以，我们不能轻敌麻痹。大家斗志昂扬，同仇敌忾，决心打胜两三个大仗，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以树立我们的军威。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三日（农历三月十六日），我部进入上杭县境，在稔田杨梅洞村驻扎了两天，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开仓济贫，并

以此引诱尾随我们的朱家齐部前来进犯，予以歼灭之。但狡猾的敌人知道杨梅洞的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对它不利，不敢冒犯。豪坑的干部、群众知道我部驻扎杨梅洞村后，多次派人前来联系，要求我们进入豪坑。第二天深夜十二点钟，我们便开拔到下都的豪坑村。当部队进村时，全村群众打着火把夹道欢迎，把一幢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房子让给我们住宿，群众的热情接待，一时难以言尽，使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部队宿营安排之后，我即派出警戒，并亲自带了连排干部去观察地形，发现村的东南是高山，是敌人的来路，西北面是小山坡，山坡以南全是群众住房，靠西面临汀江，河西敌人又能截击我们。地形不利，如果打起仗来，军事上称背水作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观察回来后，我将情况向驻队领导作了汇报，在作战研究会上，我指出豪坑不能驻兵，应迅速将部队撤离。但多数同志却认为豪坑周围都是革命基点村，群众基础好，敌人不敢轻易冒进，所以意见很不一致。

翌晨天刚破晓，我又率领干部再次观察地形地势。大约六时左右，我们刚返回营地，哨兵前来报告：汀江西岸的南蛇渡发现三十多名敌人在抓船和沉船。我立即命令连长阙美雄带一个排的兵力去把它消灭。但又有一些同志阻拦说：“敌人抓船沉船是防止我们渡河。我们不渡河，何必主动出击？”一些人认为有理，随声附和。因此，这道命令没有执行。原定当天开谷仓（国民党的储粮）分发群众，大清早周围村庄就来了不少群众，挑箩带袋，等待分粮。我考虑到如果我们正在忙于开仓分粮，敌人来个突然袭击，一时难予应付，仗一打起来，群众损失很大，所以我又向领导建议：明天再开谷仓。大家同意后，我又建议上午十二点钟部队必须登上东南面的高山，以截住敌人来路。领导同意了我这个建议，我即作好军事部署。我刚从哨所回来，曾万生同志就来邀我去作客。当地群众热情招待我们，驻队领导干部和上杭工作团团长饶良新同志都被邀参加去了。我到席后约十分钟，看到领导同志全都在场而感到不放心，从坏处着想，考虑到整个

部队的安全，便先告辞回到营房，叫警卫员陈亚尤同志泡了一杯牛乳，刚喝完，门外便响起了驳壳枪声，战斗就这样开始了。枪一响，我立即命令司号员陈南生同志吹集合号，第二声号起陈同志的右臂中弹了，这时我看见敌人以三支驳壳枪向村的小桥冲来，我马上冲上前去，对准射击，枪响人倒，三个敌人被我击毙在桥头和小溪里，我命令连长阙美雄阻击敌人。这时，又观察到周围山头都被敌人占领了，处于被包围之中，为了杀开一条路，我又命令部队把驻地后面的山头夺回来。

这次战斗我们是背水作战。当天，天气极坏，从早上到中午满天白雾茫茫，这便于敌人摸索前进，进入山头。我们部队途经永定县的杉树下村时，传染到天花，因此把染上天花的部分同志折回永定治疗，实际到达上杭的只有一个连和一个警卫排以及上杭工作团的工作人员，总人数不到二百，其中能作战的仅一百七十多人。好在都是老战士，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较好的装备，所以，在敌人包围的危急情况下，仍能灵活机动，沉着应战，坚持战斗。敌人有伪保安团朱家齐部一个中队，另加上由朱指挥的保安第四团一个中队，和永定城关、金沙、湖雷、堂背四个乡镇公所各派一至二个班，上杭城关、稔田、兰溪、庐丰、中都五个乡镇公所各派一至二个班，共计八百余。但实际进入豪坑的只有六百多人，其它的都在豪坑外围，不敢进入战斗。朱家齐为了鼓舞士气，骗取下属的信任，闭着眼睛说瞎话，扬言：“到豪坑的是赖祖雄的部队，是到上杭南蛇渡收河税的，只有几十个人、几十支破烂步枪不必害怕。”等等，以此壮胆。因此，部份敌人竟然化装起赖祖雄同志的游击队，个个身穿兰衣服，头戴有红五星帽徽的兰帽，还背了背包，打了绑腿。殊不知敌人的化装完全是弄巧反拙的，除了蒙骗他们自己和迷惑部份群众之外，个个都成了我们的活靶子。在我们夺回山头阵地时，我们看见戴红五星帽、穿兰衣服、打绑腿的，就用轻机枪扫射，决不留情，敌人佯装自己人，喊着自己人不打自己人，但我们清楚这是敌人自欺欺人的诡计，所以决不

心慈手软，打得他们惨败，所逃无几。战斗不到半小时，驻地后面敌占山头全被我们抢夺回来了。

战斗中，我们觉察到村东大小村头均有敌人盘踞，而且是敌人的指挥阵地，而村西无敌军，可作我暂时的指挥阵地：正当我们召开战地紧急会议，与连排长研究时，敌人发来一颗枪榴弹，负伤十二位同志（其中重伤二人）。由于我们的指挥阵地是村西的山头，是个孤山，背靠汀江无退路，山脚是通三益乡的大路，地形对我们十分不利。在这危急关头我当机立断，向领导建议：派半个班的战士，保卫领导同志转移到山脚下沿河芦苇丛中去休息，我与全体指战员坚守阵地，如果能坚持到下午四时，我们便进行反击。

敌人向我们发动了四次冲锋，一次比一次人多，一次比一次严密，但都被我们阻击败退。最后一次冲锋是下午四时左右，由伪保四团李玉部的一个中队长郭发生带冲，他冲到距我五十米以内时，我命令油机特等射手反击，只发两弹便把郭击毙。跟在后面的敌人拖着郭的尸体，象乱了窝的蚂蚁抱头逃走，正面的敌人也从山坡撤回村里。但朱家齐部又在山头指挥阵地吹号，只吹两声，号兵又被我步枪射手击毙了。下午五时左右，敌人全线崩溃撤逃。

这次战斗，我方负伤十九人（其中重伤四人）牺牲四人（其中两人是工作团同志，东南亚归侨，因病死亡一人），敌人死伤四十八人（这数字是解放后在永定医院敌伤病员中获悉的）。

当天下午六时许，我部经南蛇渡向汀江西岸渡江，前往广东松源整休。

郭·义·为·烈·士·传·略

刘宝联

郭义为烈士，原名肇忠、字信昌，乳名太玉生，又曾名周全。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后改名郭义为。一九〇九年农历九月他出生于上杭县濑溪区古楼乡佛岭村一个农民家里。佛岭村距上杭城二十多华里，是个居住着三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山青水秀，土地肥沃。他的童年正是军阀当道，豪富横行，农村经济残破不堪的时代。加之村中大量田地皆为他乡地主所占有，穷苦农民“日无一粒养鸡米，夜无半点老鼠粮”。他父亲郭崇山忠厚老实，母亲李新人是勤俭善良的农村劳动妇女，二个哥哥一个姐姐，祖孙三代七口人，除靠家中仅有的一些薄地外，仍要租种地主一部份土地，同时靠父亲与堂伯合营豆腐店赚一点点蝇头小利，方能度日。要是逢到歉岁荒年，父亲还得奔走他乡兼做土纸帮工才能维持全家一日三餐的生活。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深深地打下了劳动人民的苦难烙印。

义为聪明精干，勤奋好学，他在幼年时期就进了上罗（属湖洋辖）私塾。九岁那年父亲病故。一九二一年，在亲朋资助下，到濑溪的新民小学肄业，历年成绩优异，名列前茅，博得师生们的好评。一九二五年小学毕业后，又考上上杭中学，其所需求学费用除族中公尝储谷中每年拨给一石外，全靠慈母维持。从此，他更加奋发自勉，力求上进。常读各种进步刊物，逐步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

一九二八年初，义为加入革命团体——“上杭文艺研究社”，积极参加抨击社会丑恶势力和宣传革命思想。不久加入共青团。此后，又由郭百筹（文艺研究社编辑，共产党员）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